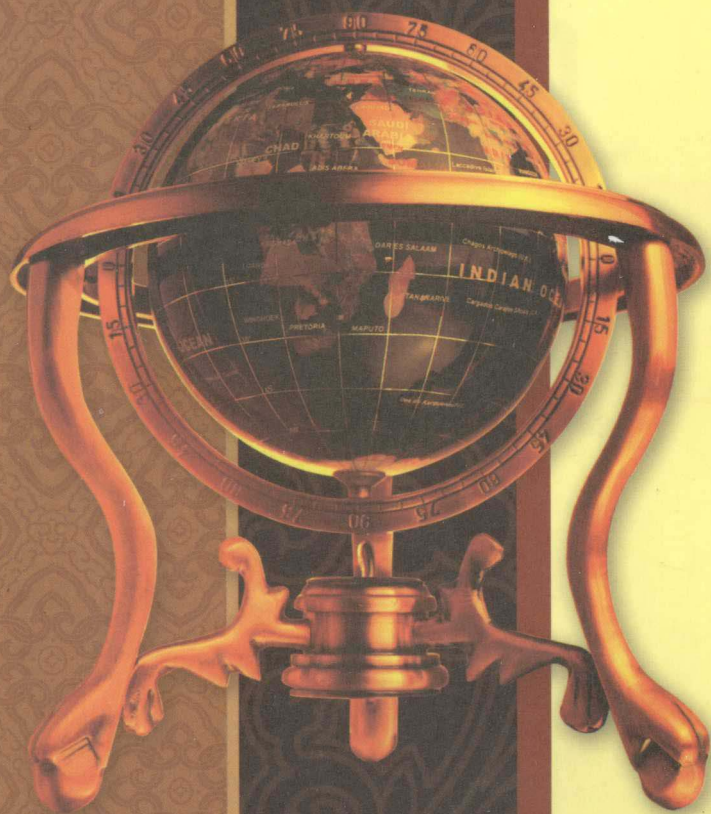


世界通史

世界文化经典

纵横时空八千载
图文并重通俗易懂
阅尽全球五大州
史料全面以古鉴今



卷四

世界文化经典

江南 主编

世界通史

卷四

京华出版社



“四国协定”签字时，美国针对日本又对条约作出两项特别保留：条约不妨碍美国与日本交涉雅浦岛问题；各国国内问题亦不受条约的限制。此项旨在防止日本启用条约做武器攻击其一直不满的美限制日本向美移民的政策。

“四国协定”签订后，由于在条约适用的范围是否包括日本本土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四大国在1922年2月6日又签订了《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补充条约》，明确规定：“四国协定”的范围不包括日本本土四岛，仅适用于日本的南库页岛、台湾、澎湖列岛和日本的委任统治地。

“四国协定”的签订是美国外交的一项重大胜利。美国以实力为后盾，辅之以坚定的外交立场、积极灵活的外交行动，彻底埋葬了英日同盟，从而一举改变了与己不利的战略态势，为与日争雄、称霸远东创造了有利条件。

英国对签订“四国协定”也甚感满意。劳合·乔治称之为英国外交的一大成功。因为英国既没有抛弃老盟友，又交结了新朋友。一个游刃于美英之间的新局面的开启，对英国来讲，无疑是有益无害。为了表彰贝尔福的功绩，英国皇室特为他授予爵位。

与英美不同，日本怀着悲喜参半的复杂心情接受了新条约。通过新协定，日本长期以来通过侵略扩张夺占的太平洋岛屿，得到了西方诸强的承认。但日本谋求延续英日同盟的外交毕竟失败，对此，日本代表对英国人幽怨地说：“无论如何，你们给英日同盟安排了一个盛大的葬礼。”

“四国协定”的签订，调整了帝国主义美、英、日、法四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关系，也暂时缓和了美、英、日在该地区的矛盾和冲突。

《五国海军条约》

限制海军军备问题是华盛顿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各国矛盾尖锐。会议一开始，美国便提出了一个限制主力舰吨位的方案，主要内容是：今后十年内停止建造主力舰（包括目前正在建造的），十年后也只能建造用以替换退役舰的主力舰；销毁某些旧舰；参照与会国现有海军力量确定各主要国家的主力舰吨位限额，美、英各50万吨，日本30万吨，即5:5:3的比例。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消除英国在主力舰方面对美国的优势并确保自己对日本的优势。

英国不难接受上述比例。由于战后英国已把自己的海军力量的理想标准定为“一强标准”，因此自然能较顺利地接受与美国的5:5的比例，而对与日本的5:3的标准也没有太大异议，它认为这个差额足以对付日本并满足国内水域的需要。

但是这一比率遭到日本的激烈反对。长期以来日本便把其主力舰吨位要达到美国的70%作为追求的目标，在日本代表团赴会前，日本政府又向他们下达了“对美绝对需要保持七比十的比例”的训令。因此日本最初坚决反对5:3的比例，要求会议注意它的“特殊需要”，坚持获得10:7的标准。然而美国在英国的支持下不肯让步，并扬言如果日本坚持己见，那么日本每造1艘军舰，美国将造4艘与之抗衡。日本自知财力不足，又需要与英美保持协调关系，只好妥协，但以英美放弃在西太平洋建设和加强海军基地为条件，后者表示同意。法、意两国在发了一通牢骚之后，也最终接受了对它们主力舰吨位的规定。

但是在辅助舰方面，除航空母舰外均未达成协议。英国借口帝国防务而拒绝限制巡洋





舰和其他水面舰只的数目；法国则借口自己的主力舰少，坚决反对削弱和限制潜水艇，并得到日、意的支持。在裁减陆军方面，会议也因为法、日、比、意等国的坚决反对而无结果。

1922年2月6日，费时近三个月而制定的五国海军条约终于最后签字。条约全称为《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条约共有3章24条。主要内容有：

1. 关于五国主力舰与航空母舰吨位的限制性规定。主力舰吨位，美英为52.5万吨，日本31.5万吨，法意各为17.5万吨，五国比例依次为5：5：3：1.75：1.75。航空母舰，美英各为13.5万吨，日本8.1万吨，法意各为6万吨。

2. 关于各类军舰最大排水量吨位和舰上炮口直径的规定。主力舰排水量不得超过3.5万吨，大炮口径不得超过16英寸。航空母舰排水量不得超过2.7万吨，炮口口径不得超过8英寸。

3. 五国十年内停造主力舰。

4. 关于美、英、日在太平洋上领地和属地内军事基地的防务维持现状范围的规定。美国除本国近海岸、阿拉斯加、巴拿马运河区各岛（阿留申群岛不包括在内）和夏威夷群岛外，在太平洋中现在或将来所有的岛屿和属地的要塞及海军基地，须维持现状；英国除加拿大附近岛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在东经110度以东（包括香港）的岛屿和属地的要塞和海军基地，亦维持原状；日本则在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奄美大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维持其所设要塞和海军基地的现状。

五国海军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又一大外交胜利。它既迫使英国彻底放弃了“双强政策”，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美国的海军优势由此开始确立，并最终取代英国成为新的海洋霸主。

日本虽没有实现其取得10：10：7的主力舰比例的外交目标，但它却成功地取得了美英在太平洋广大范围的领属地内不得增加和扩建军事基地的保证，从而使日本能够在接受美英主张的主力舰5：5：3比例的同时，继续保持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军优势。签约时，日本在小笠原群岛已构筑完成了能对美国海军形成威胁的军事基地工程，而美国却受条约限制不得在阿留申群岛、菲律宾、关岛等接近日本的区域增扩基地。实际上最后的条约对日本来说更实惠，既节省了财力，又无伤海军优势地位。

法国对五国海军条约却甚为不满。在法国人看来，“这个条约的签订是英国参加谈判的代表贝尔福取得的一个以损害法国的利益为基础的真正成功”，法国的主力舰吨位竟然降到了意大利的水平。

五国海军条约的签订实质上是五强迫于形势压力而根据各国海军现有实力状况而实行的一次暂时妥协。但它却非军备竞赛的终结。潜水艇、驱逐舰、巡洋舰等舰种并未受到限制，诸强尽可在这一些缺口领域内继续角逐。

中国问题和《九国公约》

华盛顿会议的另一个主要议题是“远东及太平洋问题”，其核心是中国问题。因为列强要争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必然要争夺中国。中国代表团在华盛顿会议上重申了在巴黎和会上所提出的要求。

中国的外交目标是，力争主动，修改《凡尔赛和约》中山东问题的条款，同时争取修改或取缔历史上与帝国主义诸强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和严重损毁中国主权的外国在华特权。





中国向华盛顿派出了达一百多人的大规模的代表团。主要代表是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前司法总长王宠惠。

1921年11月16日，远东及太平洋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由美国务卿休斯主持。

会前，中国代表团已接到休斯授意，要求先提出原则问题进行讨论。中国代表完全照此行事。会上，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首先发言，提出了“十大原则”，作为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基础。

“十大原则”主要内容如下：

1. 各国尊重中国“领土之完整及政治行政之独立”；
2. 中国完全赞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之原则；
3. 没有中国参加，各国不得缔结直接有关中国或太平洋与远东和平之条约或协约；
4. 以往中国政府给予外国的一切特别权利，应予废除；
5. 中国在司法、政治、经济与行政上所受之限制，应予取消；
6. 中国与各国已经签订的成约中没有限期者，都须给以确定的期限；
7. 凡关于给予特别权利或特别权益的文据，应依照通行的解释原则，从严核实解释；
8. 将来发生战争时，中国如不加入，其中立权利应受到完全尊重；
9. 应订立和平解决条文，以便解决太平洋及远东地区有争议之国际问题；
10. 应订立条款，以便随时召集会议，讨论关于太平洋与远东地区国际问题，并作为缔约国决定共同政策之基础。

中国的提案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代表卢特把十项原则归纳为四条，作为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一、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即中国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二、给予中国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个有力而巩固的政府；三、各国在中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四、不得利用中国的现状，谋取特别权利，以致削减其他国家的权利，也不得赞助有损他国安全的行为。日本代表加藤对“行政的完整”的含意进行询问，卢特说这不影响合法的特殊权益，日本代表对此表示满意。可见，所谓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只是维持中国作为半殖民地的“完整”，以利于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政策。但四条原则当然是对企图独占中国的日本的一个打击，但既然保持了日本原有掠夺的利益，日本也表示可以接受。经过会议讨论通过，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导原则。

根据“卢特四原则”，中国代表提出了收回山东的要求；在国内人民强烈要求下，中国代表又向远东总委员会提出，“二十一条”严重影响中国的生存、独立和完整，应当予以废除。日本代表认为这是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不能在大会上讨论，而只能在中日两国进行双边谈判时解决。中国政府最反对的就是直接与日本单独谈判。这使英美两国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为应付国内外舆论，它们必须公开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可是又不想得罪日本，从而影响正在进行的其他谈判。最后在美国的斡旋下，采取折中的办法，中日在会外进行谈判，英美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参加。

谈判从1921年12月1日正式开始。在谈判中，双方争执最激烈的是胶济铁路问题。日本要求接替以前德国的一切权益，不但包括铁路，而且包括铁路区域内的矿藏，以及整个山东省的经济权益。而中国代表则坚持收回利权，赎回胶济铁路。中国代表据理力争，同时美国施加了压力，最终使日本作出让步，提出铁路由中日公司合办，后来虽同意将铁路售于中国，但又拒绝中国用现款支付，想借此继续控制铁路，中国代表坚决不肯同意，最后在美国总统哈定直接干预下，中国政府才被迫接受了日本的方案。





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进行得很不充分。在会谈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曾一度休会，直到整个大会即将结束前几天的2月2日才恢复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谈判中，日本代表币原声称，“二十一条”是经过两国政府正式批准的，完全合乎国际惯例，并威胁说，如果废除这一条约，将使亚洲、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国际关系出现不稳定局面，而带来不良后果。在中国代表的坚决要求和各方压力下，日本才被迫放弃了部分次要条款，如：将获得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建造铁路借款的优先权，以及这两个地区的各种税款作抵押的借款的优先权让与四国银行团；放弃向“南满”派遣顾问和教官的优先权等。中国代表不满意日本的让步，还想继续讨论，但英美却认为日本的让步已经达到了最大限度，中国应该满足了，因此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会议匆匆收场。

1922年2月4日，中日签订了《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

《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共有28条内容。条约规定，日本将胶州租借地归还中国，具体涉及撤退日军，移交公产、矿山、盐场、海关等多项内容。条约第14条至第21条规定了胶济铁路的解决办法，具体为：按德国过去对该铁路做的估价，中国付给日本5340.06141万金马克赎回铁路。赎金以中国国库券形式交付日本，期限15年，5年后中国应通知日本，将国库券全部或一部分偿清；中国在赎回铁路之前，须选任日本二人一为车务长，一为会计长，其属中国局长管辖，有相当理由时可以撤换。

从条约内容来看，日本通过附加条件，在山东仍然保留了相当的经济势力，但日本不得不在条约中宣布把山东归还中国，把它在《凡尔赛和约》中吞下的赃物又吐了出来。因此，华盛顿会议期间对山东问题的解决，无疑是中国旧时代外交少有的一次胜利。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以弱胜强，辛苦困难自不待言，中日谈判历时两个多月，仅大的会议就达36次之多，经过艰难的外交斗争，中国代表为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争回了主权。

美国在山东问题解决过程中也起了一定作用，从美日争夺远东霸权的角度看，这也是美国对日本取得的一大外交胜利。

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意、日、荷、比、葡、中九国签订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为《九国公约》。

《九国公约》共有九项条款，主要内容是公约前四项所列的卢特“四点原则”，此外还有在中国全境铁路维持“机会均等、门户开放”原则、缔约各国尊重中国遇有战争决定不参战时之中立权利等内容。

《九国公约》的核心是肯定了美国提出的在中国实行“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这一条约的签订使日本独占中国的政策受到沉重打击，却标志着美国外交的又一重大胜利。条约签字后，休斯掩不住得意之色，说：“多亏这个条约，对华‘门户开放’终于实现了。”

毛泽东曾敏锐地分析和评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1922年美国召集的九国华盛顿会议，又使中国回复到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希特勒在德国上台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受到了战胜国的压制，丧失了大片的领土，还要付出沉重的赔款，在军事方面，还有苛刻的限制。这给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上台提供了借口。希特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了德国统治者的宝座。

1889年，阿道夫·希特勒出生于德奥边境奥地利一侧的布劳瑙镇，他的父亲曾是鞋匠和奥地利一个海关小官员。希特勒从小开始就喜欢美术，曾幻想当一名画家。由于各科成绩太差，他没毕业就中学退学了。十八岁时，他到维也纳报考美术学院，但因成绩不理想而未被录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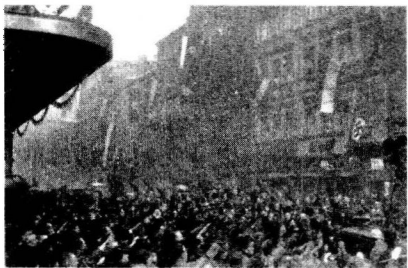
由于缺乏才能，希特勒靠从事各种最卑贱的工作来糊口，过了五年悲惨的生活。在这期间，希特勒曾经靠各种各样的杂活，绘制拙劣的风景画片来维持生计。也就是在这段期间，希特勒开始仇恨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仇恨德国的议会制政体，蔑视富裕的资产阶级及其糜烂的生活。

1913年，希特勒浪流到了慕尼黑，并于次年加入了巴伐利亚团服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在西线待了四年。在战争期间，希特勒作战十分勇敢，曾三次负伤并荣获令人羡慕的铁十字勋章，但除此之外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才能，直到1917年由最初的传令兵升为下士。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战败国，不得不接受了协约国提出的苛刻要求。这些要求包括放弃德国在世界上的殖民地，割让大量领土，不得保持军队，付出大量赔款等。虽然德国政府后来不得不签署了《凡尔赛和约》，但是德国人民对此却强烈反对。

1919年1月5日，慕尼黑铁路工人安东·特莱克斯勒创建了具有复仇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组织“德意志工人党”。9月，当时作为慕尼黑陆军政治部侦探的希特勒受命调查“德意志工人党”的一次集会。但是希特勒却在这次集会上发表了有关强大的德意志的言论。次日，该党给希特勒发出邀请信，要他加入该党。出于好奇心，希特勒参加了“德意志工人党”的一次会议，并成为其第55名党员和主席团的第7名委员。1920年，希特勒被任命为该党“宣传部长”。

1920年2月，希特勒在一个啤酒馆组织了一次大规模集会。在会上，希特勒具体阐述了“德意志工人党”的党纲，即《25点纲领》。在这个党纲中，希特勒宣称要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帝国”，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日耳曼中央集权国家；提出实现“社会主义”，让工人分享企业利润，取消地租等口号；要求废除《凡尔赛和约》；规定犹太人不能担任德国的任何官职等。应该说，希特勒把民族主义和欺骗广大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结合起来，期望能够实现他的政治梦想。



1920年4月1日，希特勒将“德国工人党”改名
充满狂热气氛的纳粹党集会
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由于该党的德文缩写音译为“纳粹”，因此简称“纳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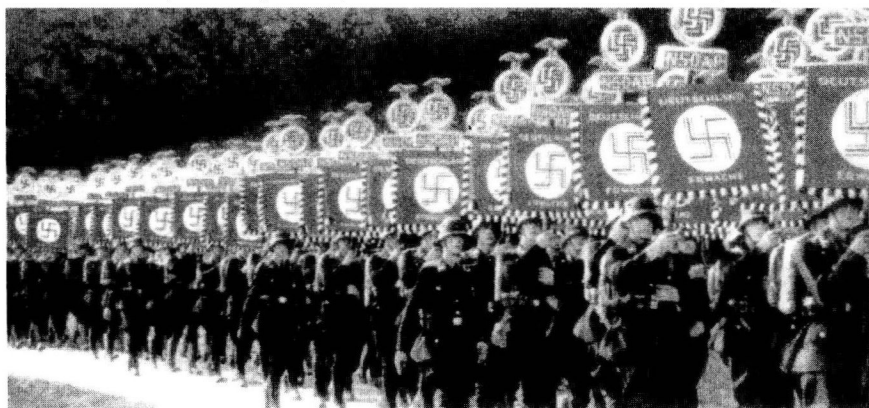
党”，并把《25点纲领》作为该党的正式纲领。1921年7月，希特勒迫使特莱克斯勒修改了党章，让他自己担任主席，宣布了“领袖原则”，从而当上纳粹党的“元首”。

1921年10月，希特勒正式组建纳粹党的军事冲锋队，他把退伍军人拉拢在自己身边，组织成身穿褐色衬衫的“冲锋队”，“冲锋队员”臂带“C”标志。希特勒密谋着要发动一次夺权政变。

1923年11月8日，巴伐利亚长官卡尔应邀在慕尼黑一家名叫格勃劳凯勒的大啤酒馆讲述施政纲领。希特勒率领一群纳粹冲锋队员包围了该啤酒馆，把卡尔和另外两名巴伐利亚高级官员押到一间小屋里，要求他们和自己合作组成新政府。但是这3位官员死活不肯答应。这时，德国有名的鲁登道夫将军也来到了这里，一起劝说。

巴伐利亚官员不得不答应了希特勒的要求，但是马上乘机逃走了。希特勒知晓后马上带领纳粹分子向市政府进发，但是遭到早有准备的政府军的镇压。几天后，希特勒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在法庭上，希特勒以他的口才，滔滔不绝地宣扬民族主义，并且宣称“我要做马克思主义的摧毁者”。当时，希特勒三十五岁。

在关押期间，希特勒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一部夸张的长篇自传体回忆录。在书中，希特勒大肆宣扬日耳曼民族是主宰世界的优等民族，有权统治其他“低等”种族，而犹太人是最低等的民族；此外，他还极力发泄了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叫嚣要对外扩



德国纳粹士兵在列队行进

张，以求得德国的生存空间；详细说明了战败的德国怎样才能成为“全人类的君主”。

他说：“对于形成雅利安这种高等的文化，作为奴隶的其他低等民族要比家畜更加重要”、“世界史是作为征服者的少数民族的历史，而那个少数民族只有一个”、“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人民今天已经破败无奈，国土被瓜分，民族被分裂，生存空间被堵死，德国被全世界侮辱”。这些言论，使得希特勒在德国有了很大的听众，并且马上扬名德国。

除了完成这本著名的《我的奋斗》之外，希特勒还在狱中认真思考，领悟到不能单靠武力去夺取政权，而应该进入国会，和天主教议员和马克思主义议员打交道。因此，他决定要利用宪法给予的合法权利，争取国会的多数选票而当选政府首脑。

1924年12月20日，希特勒出狱，这时离他入狱才9个月。此时，希特勒被禁止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其党徒也从原先的5万人减少到了1.5万人。在1924年12月的选举中，纳粹党仅获得14个席位和908000张选票；在1928年5月的选举中，纳粹党获得的席位和票数则更少——12个席位和81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2.6%。





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开始。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德国工业开始直线下降，其生产资料 and 消费品的生产指数分别倒退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水平。1931年，德国四大银行之一的达姆斯达特国家银行宣布破产。此后，德累斯顿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继破产。在危机中，德国工人失业人数开始迅速增长，从危机爆发前1929年9月的130万猛升到1932年的800万，占全国工人总数的44%，此外还有27%的工人处于半失业状态。

在经济危机爆发时，当时的政府是一个中间偏左的联合政府，由社会党人赫尔曼·米勒总理领导。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内阁一样，米勒内阁也因如何解决大萧条造成的失业和其他问题方面的争论而逐渐遭到破坏。

由于经济政策的分歧，社会民主党人米勒不得不于1930年3月辞去总理职务，天主教中央党右翼布吕宁上台组阁。布吕宁是中央党的一位冷酷、严厉但却聪明、正直的成员，他所博得的是尊敬而不是友谊。

经济危机导致工人运动高潮迭起，1932年的两个月内就爆发了900次罢工。垄断资产阶级感到布吕宁政府已经不能有所作为了，他们迫切希望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夺取殖民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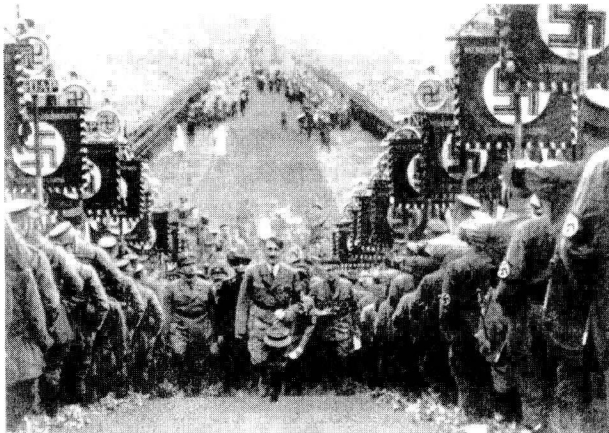
经济危机给纳粹党提供了重整旗鼓、夺取政权的机会。希特勒乘机派出自己的党徒们到中小城市和农村进行宣传，到处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张贴广告。希特勒本人也租用了一架飞机，到各城市进行演讲。在上台之前，希特勒曾经3次周游德国，到达了60多个城市。此外，纳粹党还将希特勒和戈贝尔进行竞选演说的电影、唱片和希特勒的照片传播到德国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些演讲和宣传中，希特勒保证在其上台后废除《凡尔赛和约》，取消军备限制，拒绝赔付战争赔款，收回战后失去的土地，并且向民众承诺将德国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同时，他还向工人们保证，纳粹党将取消失业现象；向农民保证，将禁止拍卖土地。

处于绝望中的工人、农民、中小工商业者和学生被希特勒煽动性的言语所蒙蔽，同时也不满魏玛民主政府的软弱无能，积极支持纳粹党的选举。纳粹党徒从希特勒出狱时的1.5万人增加到了1929年的17万人，此后增加到1930年的38万人，1931年则超过了80万。1930年，德国进行国会选举，纳粹党获得了107个议席，从德国第9个小党派跃居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

在拉拢中下层民众的同时，希特勒又积极和垄断资产阶级相勾结，同时获得他们的大量资金支持。1931年8月，希特勒在垄断资本家的一个别墅向资本家发表演说，其后，希特勒在全国各地游说资本家。次年1月，希特勒在杜塞尔多夫工业家具俱乐部向聚会的300名垄断资本家发表演说，向其保证决不触犯私有财产，同时鼓吹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攻击马克思主义思想，主张建立军事独裁统治，扩军备战。

布吕宁政府在执政期间，并没有得到国会的支持。因此，他经常



希特勒走上纳粹德国的最高统治宝座





利用魏玛宪法第48条所赋予的权利，依靠颁布“紧急条例”来管理国家。这种“紧急条例”在1930年颁发了5次，到1932年的时候就达到了66次。

1932年春天，德国总统兴登堡任期届满。在3月举行的新任总统选举中，兴登堡作为总统候选人参加了竞选。最后，兴登堡再次以多数票当选。

在希特勒的策动下，兴登堡逼迫布吕宁递交了辞呈。希特勒以取消先前颁布的对纳粹党冲锋队的禁令和再次举行国会选举为先决条件，答应总统兴登堡自主人选组阁。

6月，兴登堡任命冯·巴布取代布吕宁上台组阁。由于得到德国年轻人、学生、一部分工人和垄断资本家的支持，希特勒在1932年7月的德国选举中获得了1300万选票，纳粹党获得了230个议会席位，成为德国第一大政党。

希特勒这时成为全国第一大政党的首脑。11月，垄断资本家赫特、凯普勒与党卫军头目希姆莱一起向兴登堡总统请愿，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在希特勒和兴登堡总统的谈判中，兴登堡要求希特勒在巴布手下担任副总理，希特勒表示拒绝。当兴登堡问希特勒到底想干什么时，希特勒说希望“得到与墨索里尼在进军罗马后所行使的同样的权力”。兴登堡拒绝了这个要求。

但是兴登堡也知道巴布政府也同样得不到国会的绝大多数支持。于是，兴登堡解除了巴布的总理职务。由于国防军将领施莱彻尔向兴登堡保证能得到国会绝大多数的支持，兴登堡于12月1日任命施莱彻尔担任新任总理。

施莱彻尔上台后，采取了一些代表下层人民利益的措施，例如废除了巴布政府发布的有关降低工人工资和救济金的政策，答应降低有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等。垄断资本家和容克地主对施莱彻尔的政策深感不安，兴登堡也对这些政策非常不满。因此，施莱彻尔还是没有得到国会的支持。

希特勒和巴布一起组成联盟，反对施莱彻尔政府。1933年1月4日，巴布和希特勒在科隆举行秘密会谈，商定以“希特勒——巴布”内阁取代施莱彻尔内阁，希特勒为总理，巴布为副总理。同时，这个内阁还吸收其他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入阁，纳粹党人在内阁中只能占少数职位，不得担任外交、国防、经济等部门的部长之职。

1月23日，施莱彻尔会见兴登堡，承认自己也不能得到国会支持，希望总统支持他按照宪法第48条的规定发布“紧急条例”，要求解散国会。在这一要求遭到兴登堡拒绝之后，施莱彻尔提出辞呈。

1月30日，兴登堡正式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巴布为德国副总理。纳粹正式在德国获得了政权。

此后，希特勒加紧在德国建立法西斯专政。1933年2月1日，兴登堡宣布解散国会，并宣布在3月再次进行国会选举。2月27日，纳粹分子在戈林的策划下制造了“国会纵火案”，然后将之嫁罪给共产党。此后，纳粹党徒带领警察查封了共产党的机关，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28日，希特勒政府发布“保卫人民和国家令”，取消魏玛宪法中有关新闻自由、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通信自由的条款。

3月5日，继前所未有的宣传和恐怖主义之后，德国新国会选举开始。但是纳粹党人仍然只占总票数的44%。当议员们聚会时，希特勒宣布共产党人的席位无效，然后，与天主教中央党做成一笔交易，由后者给予他足够的票数。

3月23日，国会在纳粹党的控制下通过了《授权法》，给了希特勒长达四年的以法令进行统治的权力。到1933年夏时，纳粹党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德国的工会、学校、教会、政党、交流媒介、司法系统和联邦各州。此后，德国建立了法西斯专政政权。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年老去世。此后，希特勒把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合为一体。9月，纳粹党代表大会在纽伦堡召开，希特勒宣布：“德国今后1000年的生活方式已被清楚地确定。”

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抬头。希特勒上台之后，加紧扩军备战，两年时间，德国的军队就超过了50万，完全违反了《凡尔赛和约》。此后，德国取消了一切民主，推翻了魏玛共和国，在德国建立了法西斯专政统治，没有一种道德规范受到尊重，柏林成为了世界罪恶渊薮。这直接导致了德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策源地之一。

国会纵火案

“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原德国驻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在纽伦堡就刑前，对曾经烜赫一时铁蹄踏遍欧洲的第三帝国的痛切之辞。至今，人们一想起令整个欧洲战栗十二年的黑暗时期，不禁都会感叹，一个以“理性”自豪的民族怎么会匍匐在一个狂人脚下，一个为世界贡献了康德、歌德、贝多芬、巴赫等许多人类崇高、美好精神代表的民族，怎么会在风景如画的东欧竖起高耸入云的焚尸炉烟囱。德国人民除了在“逃避自由”、自甘为奴这一点上要反躬自责外，还有责任重新审视制造种种罪孽的纳粹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堂而皇之地把政权捞到手的。

纳粹党控制政权的关键一步就是在“国会纵火案”上做尽了文章，振振有词地制造了20世纪令人叹为观止的弥天大谎。今天，当我们在自由的空气中翻开德国历史上这不堪入目的一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正是这一事件，点燃了纳粹党控制德国以至于吞并世界的欲火。

纵火案的发生

1933年2月27日晚，德国国会大厦内有人纵火。来回在议会大厅内散布火种的男子被警察抓获时已累得汗流如雨，警察问他为什么放火，情绪激动的纵火犯竟脱口而出：“这是信号！这是革命的烽火！”从他的裤兜里搜出了传单和护照，传单的内容是德国共产党号召进行阶级斗争。从护照上得知，此人名叫马里努斯·范·德尔·卢贝，1909年1月13日生，荷兰布莱登市人。放火的原来是个外国人。

此刻的卢贝欣然回味起已完成的神圣使命。昨天，他还和德国共产党的成员，他在德国新交的朋友瓦钦斯基想象大火烧起来德国工人阶级揭竿而起的壮景。十几个钟头前，他还想：“看着吧，到明天，世界就该变样子了，这可是我干的。”如今，兑现了，他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让那些卢贝看起来畏畏缩缩的荷兰工人看看！让那帮软弱的成不了气候的荷兰共产党看看！当初的那位羞怯、感情细腻、喜欢空想的荷兰布莱登市穷人家的孩子，现在长成了憧憬着成功和冒险的青年，他期待着轰轰烈烈的革命烽火燎原。卢贝退出他不满意的荷兰共产党后，加入了一个叫“国际共产主义集团”的左翼团体。也凑巧，受德国一个左翼工人团体之邀，卢贝代替“国际共产主义集团”的负责人来到德国。卢贝对德国工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是不抱希望的。法西斯上台的危险是明眼人一望便知的事实，可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竟以为会通过选举战胜纳粹。在卢贝看来，这





熊熊燃烧的国会大厦

是愚蠢的坐以待毙的政策，卢贝坚信他的使命是点燃德国工人阶级反抗法西斯的抗争火种。“最好是放把火把国会大厦烧掉”，卢贝的想法得到了瓦钦斯基和其他几个对党的“老实”政策不满的德国共产党员的支持。

听到有人放火焚烧国会大厦的消息，戈林吃惊不小。

十年内，赫尔曼·戈林已由一个英俊年轻的飞行员变成体态肥胖的德国官员。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空中英雄、著名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最后一任队长、德国战时最高奖章功勋奖章获得者，曾几何时已一头扎在希特勒脚下，原来仅仅是在希特勒的打手队——“冲锋队”——里当头，现在他很风光地作为国会议长和控制着警察的普鲁士邦的内政部长，在普鲁士内务部大楼里加班。听国会大厦的守卫说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是共产党员恩斯特·托格勒和威廉·凯念两个人时，戈林认为他们是重要的嫌疑分子，下令将他们逮捕起来。戈林对周围人说，可能是共产党想通过纵火造成混乱，乘机搞武装暴动。他命令全体警察立即进入戒备状态。

不久，上任一个多月的新总理希特勒赶到了现场。听完戈林的报告，他挥动着双手，滔滔不绝地对身旁的人说：“非得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不可！谁反对我们，我们就把他们彻底搞掉！德意志国民以前太老实了，共产党的活动家全都要枪毙！今天夜里就要把共产党的国会议员绞死！同情共产党的，要把他们关进监狱里！对社会民主党和国旗团（社会民主党的战斗团体）也要如法炮制！”在元首的亲自过问下，纳粹行动得相当快，案发后不到五小时内就提出了应予逮捕者名单和一项旨在扩大侦察权的法案。

也许是巧合，戈林手下的政治警察（盖世太保）近乎是阴错阳差地把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在柏林工作的共产国际特派员季米特洛夫作为卢贝的同案犯逮住了。季米特洛夫所住旅馆的一个侍役向警察告密说，这个“俄国人”曾和卢贝一起坐在角落里嘀嘀咕咕。于是，盖世太保就找他的茬，说他的护照是假的，逮捕了他。能够把国会纵火案与共产党扯上就很不错了，若能把“共产国际”也扯进来，对于总是叫嚣要消灭“共产主义九头妖”、打翻“赤色恶魔”的希特勒来说，那真是天赐良机。

季米特洛夫作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内最信任的人物，当时是共产国际西欧局负责人。他来柏林是搞宣传和搜集情报的，并不是与德国共产党一起行动，岂料被便衣警察候个正着，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另外两个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在此之前，柏林警察局的政治警察就听说有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外国人，有人看到他在公共场合和共产党员交头接耳。在盖世太保看来，赤色苏联来的人必定是居心不良的阴谋煽动家；何况，现在也正用得着，与共产党不是斗得正欢吗？可以利用这件事来杀杀德国共产党的威风。正因如此，事情变得有意义了。尽管纳粹党一度对季米特洛夫不是个俄国人很失望，然





而，只要他是共产党，就够了。也正因如此，侦察工作不是由刑事警察而是由盖世太保来接手。

祸水引向共产党

希特勒和身为盖世太保总监的戈林为侦察工作定了调。希特勒于案发后一个半钟头，在幸免于火灾的议长室里召集了政府首脑会议，他从兴奋得有些失常的戈林那里听说案犯身上有共产党的党证，便别有用心地断定纵火案是共产党预谋的犯罪行为，他无比愤慨地叫道：“这是共产主义者干的勾当，这是天佑，光耀德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到来了，诸位，你们马上就会看到的。”

因此，侦察就根据所谓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是卢贝的同谋犯的政治判断而进行。当然，盖世太保为了求证这一点，是会殚精竭虑的。没有事实也不打紧，难道不能制造一个事实吗？“谎言重复千遍，就会成为真理。”何况，现在的新闻舆论都控制在即将成为国民教育和宣传部长戈培尔手里，这个瘸腿的摇唇鼓舌的天才现在有了攻讦的对象，可以大显身手了。他马上跑到纳粹党的喉舌《人民观察家报》编辑部内命令改版，并跟在希特勒身后气势汹汹地说：“应该马上在国会大厦前的广场上把逮捕的犯人处死。”

这些天对于纳粹党来说真是好戏连台。政治警察在案发前三天强行搜查了德国共产党总部“卡尔·李卡克内西馆”，从抄来的文件中，普鲁士内务部以发现了“武装起义计划”为由，向人民发出了共产党“武装起义迫在眉睫”的警告：他们又耳闻德国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建议与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建立对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现在又出了这码事，天赐良机，有了如此好的借口，纳粹党可以好好地做一番文章了。

为什么德国法西斯这么急于要把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搞掉呢？事情很简单，新上任的希特勒要大权独揽，实现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愿望。

1933年1月30日，对于20世纪的人类来说，这是一个黑色的日子。“第三帝国”，这个德国动乱政治中的怪胎被纳粹党从肌体衰弱的魏玛共和国体内拽了出来。这一天，希特勒通过无数桩见不得人的幕后交易，获得了他一直呵护得很好的陆军的支持和大垄断企业的撑腰，最后一刻，老朽的总统兴登堡也对任命他以往一直鄙夷不屑的“波希米亚下士”为总理勉强点了下头，于是，希特勒便在喽啰们弹冠相庆的聒噪声中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当上了德国总理。

但是，希特勒当了总理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就操纵在纳粹党手中。在内阁11个职位中，他们只占三个，而且除了总理外，他们所占职位都不十分重要。弗立克担任内政部长，但因为德国的警察是由各邦自己控制的，所以他这个内政部长等于是个空架子。空军英雄戈林免不了也要谋个一官半职的，但是没有合适的位子给他，于是他被任命为不管部长。内阁其他几个重要的职位则都在副总理弗朗兹·冯·巴本的手里。也就是说，希特勒及其纳粹势力的背后，还有总统、陆军、保守分子三股力量的掣肘，不能大权独揽，随心所欲。

希特勒、纳粹党通向独裁的关键就是要从兴登堡总统那里取得宪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权利：在紧急状态下，只要总统批准，可以不需议会多数支持而仅凭总统紧急法令来行使职权。总理将取代国会获得立法权，也就是说，内阁政府——在希特勒看来，就是纳粹党和他本人了——有制订宪法的权力，把国会抛在一边。要达到这一点，必须修改宪法，需要国会里有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才能通过。因此，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控制国会，争取大多数





议员支持。但是，参加内阁的纳粹党和支持巴本的休根堡民族党在国会 583 个席位中只占 247 席，尚不足够成多数，因此，还需要至关重要的 70 票支持。为达此目的，希特勒及其同伙便开始玩弄政治手腕，诱使其他党派力量领袖同意进行国会重新选举。这是文的一套手法。

当选举逐步展开的时候，希特勒又施展了武的一套手法。他们指使手下那些拳大臂粗的冲锋队员不断制造挑衅行动，目的是引起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争斗，为政府出面收拾这两个工人阶级政党提供借口。戈培尔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次日，就曾在日记中写道：“目前我们暂不采取直接的对抗行动。必须先让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尝试爆发出来。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将要采取行动。”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动静。这两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早就结了冤家。共产党直到不久前才改变与社会民主党为敌的政策。此前，它一直认为希特勒夺权并不可怕，反而会激发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认为“中间派”的社会民主党比起纳粹党对工人阶级的毒害更大。在希特勒纳粹势力崛起后，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并未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甚至在对方召开大会时还相互打斗。分裂的状态使他们在希特勒粉墨登场的政治闹剧中无所作为。何况，希特勒一上台后，就取缔了共产党的集会，封闭了共产党的报纸，社会民主党则由冲锋队的打手来对付，总之，希特勒预计的革命并未爆发。

“国会纵火案”就发生在这节骨眼上。

纳粹党“趁火打劫”

现在，希特勒可以振振有词地跑到总统那儿去要求改变社会的无序状态，再也不能任其他各种力量撒野了。案发的当天，希特勒召开内阁会议后，直奔总统官邸，请总统签署内务部制订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法》。在此之前，总统被勃鲁宁、巴本、施莱彻尔三届政府走马灯式的换届搞得很恼怒，希望早日结束政治上的混乱、动荡状态。尽管当初他对任命希特勒这个“啤酒馆政变”中的小丑为总理颇不以为然，说他顶多只能当个邮电部长，但他现在并未阻拦新总理的应急举措，根据宪法第四十八条行使立法权的权力，批准了该法。第二天（2月28日），《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作为《总统紧急法令》颁布了。《法令》暂时停止执行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七项条款。其主要内容是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表达意见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结社和集会自由；对邮件、电报和电话进行检查；对搜查住宅发给许可证件；发出没收以及限制财产的命令。

除此之外，它还规定中央政府在必要时可接管德意志各邦的全部权力，以恢复那里的公共秩序。

《法令》废除了《魏玛宪法》中对基本人权的規定，希特勒现在能处在合法的地位随意抓人了。不久，约 4000 多名共产党干部和许多社会民主党及自由主义领袖遭到了逮捕，一些根据法律享有豁免权的议员也照抓不误。国会大厦守卫说 2 月 27 日最后离开大厦的是共产党国会党团领袖托格勒，为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主动到警察局说明情况，即被逮捕。几天后，德共领袖台尔曼也身陷囹圄。季米特洛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逮捕的。

在 3 月 5 日举行选举之前。整车的纳粹冲锋队员在城市街道上横冲直闯，往往未经许可便破门而入，把人带走。共产党的报纸和政治集会被关闭，其他自由党派的报纸也被勒令停刊。纳粹党人手头掌握了普鲁士政府的权力，大企业纷纷掏钱援助，电台也尽是纳粹的危言耸听和拉拢许诺之言，纳粹的卐字旗在电台的聒噪声中淹没了大街小巷。



尽管如此,3月5日的选举,纳粹党并未大获全胜。他们得票数只占总数的44%,这表明仍有大多数人反对希特勒。在国会中,即使加上民族党的席位,也并未获得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不过他们另有办法,81个共产党议席可以让它们空着,余下来的,戈林认为,可以用“不让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入场”的办法轻而易举地解决掉。

第三帝国第一届国会于3月21日在波茨坦的忠烈祠举行。3月21日是俾斯麦主持第二帝国第一届国会召开的日子,而此次会议地址又是普鲁士主义的圣地,霍亨索伦王朝历代君王都来此作过礼拜。腓特烈大帝的遗体在这里,兴登堡也来此朝过圣。希特勒用意很明显。煽起民族主义的热情,尤其是在众人怒斥的《凡尔赛条约》给德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民族创伤的情况下,这一点不会遭众人反对的。效果果然不错。希特勒甚至还煞费苦心地在兴登堡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这可真感动了这位老总统,尽管希特勒此时心里想着的是将这老朽的权力也夺过来。

纳粹控制的国会机器迅速转动起来了。3月23日,在旁听席上冲锋队员一片“交出全部权力”的叫嚷声中,希特勒如愿以偿地看到“授权法”——《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通过。它规定,把立法权、批准与外国的缔约权、宪法修正权从国会手里拿过来移交内阁;甚至还规定,内阁制订的法律由总理起草,并且可以“不同于宪法”。就这样,希特勒果然实现了他在“啤酒馆政变”后拟定的用和平、“合法”手段夺权的计划。

从此,议会民主制度在德国已不复存在。国会尽管与第三帝国相始终,却只是仰元首鼻息的摆设,是元首声音的传声筒。同年8月,兴登堡死后,希特勒干脆就一身兼任数职,元首兼国家总理,同时又是武装部队总司令。德国从此朝着战争轨道迅跑。完全可以说,国会纵火案给他提供了消灭敌手的契机,难怪当初他接到报案时,大叫这是“天佑”呢。魔鬼撒旦总是要作恶的,多个行恶的借口只不过使他更肆无忌惮而已。

西班牙内战

概况

西班牙地处西南欧的比利牛斯半岛,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还是一个社会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天主教会拥有很大的权势,许多重要工业部门则控制在英、美等外国资本手中,而工农大众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生活极其困苦。此外,国内还有复杂的民族问题。1929年10月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给西班牙以沉重的打击,失业工人达50万,失业雇农近100万,社会矛盾迅速激化。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布成立共和国,建立了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国王阿方索十三世逃亡法国,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新政府颁布宪法,开始实行民主改革,宣布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宣布教会同国家分离,禁止耶稣会活动,在某些地区实行土地改革,降低了一些地租,给予加泰洛尼亚族以一定的自治权等。但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就业和工资问题以及民族自治权等重大社会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因而工农运动和民族运动继续高涨。

西班牙资产阶级政府的民主改革虽然不彻底,仍引起了保皇派分子、教权派、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和军队反动将领的仇视。他们策划反对政府的阴谋活动，伺机夺取政权。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出现的法西斯组织，受到希特勒在德国夺取政权的鼓舞，也加紧活动起来。1933年10月29日，法西斯分子成立“西班牙长枪党”。长枪党鼓吹通过“民族革命”去反对“现行制度”，宣称要“统一被分离运动、党派间的矛盾和阶级斗争所分裂的祖国”，建立“为统一祖国服务的、有效的和有权力的新国家”，次年2月，该党与另一法西斯组织“国家工团主义者进军洪达”联合为统一法西斯党——“西班牙长枪党与国家工团主义者进军洪达”。西班牙法西斯缺乏群众基础，合并后的长枪党党徒不过三千人，其追随者主要是青年，因而它一成立就同国内的极右派和德、意法西斯建立了联系。军队中的反共和国势力也于1933年成立了一个专事武装政变的秘密反动组织——“西班牙军事联盟”。这些反动势力为了镇压不断高涨的西班牙人民革命浪潮而相互勾结起来。

从西班牙共和国成立起，民主势力和反动势力进行了多次较量，政权几易其手，斗争越来越激烈，其形式从议会斗争逐渐转化为武力对抗。

1933年11月议会选举，大地主、天主教僧侣、金融巨头等反动势力联合组成所谓“塞达党”。该党通过对选民实行欺骗和恐怖手段取得多数议席，并于12月成立了以亚历汉德罗·勒鲁斯为总理的亲法西斯反动政府。勒鲁斯政府一成立，就着手清除“共和国的遗产”，大赦保皇派叛乱分子，重新允许耶稣会活动，停止进行土地改革，对人民实行独裁统治。西班牙历史进入“黑暗的两年”。

面对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以何塞·狄亚斯为首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展开英勇斗争，推动了西班牙民主力量的联合。1934年10月初，为抗议三名亲法西斯分子入阁，西班牙爆发100万工人的政治大罢工，许多地方的罢工转变为革命起义。北部阿斯图里亚的矿工在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共同领导下，坚持战斗了20多天，才被政府军队镇压下去。

十月起义失败后，西班牙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它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人民阵线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影响下，加强了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同年底，共产党同社会党达成关于共同反对白色恐怖和争取恢复民主自由的协定。1935年6月，西共中央号召西班牙劳动人民成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11月，西共领导的“统一劳工总同盟”加入西班牙社会党领导的“劳工总会”，使之成为拥有65万以上工人的统一工会组织。共产党、左翼共产党、共和联盟、工团主义党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的代表们经过谈判，于1936年1月15日签订了人民阵线公约，提出包括大赦政治犯，恢复民主权利，改善工农生活，解散保皇党和法西斯组织等内容的人民阵线纲领。

1936年2月16日，西班牙议会举行新的选举。参加人民阵线的左翼政党击败共和党保守派、教权派和保皇派，取得选举的重大胜利。2月19日，左翼共和党人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组织新政府。5月，阿萨尼亚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共和党人何塞·希拉尔出任总理。在人民阵线支持下，左翼共和党人政府采取一系列重要改革措施，释放3万名政治犯，实行社会劳动立法，恢复在“黑暗的两年”中被解雇工人的工作，重新实施土地改革法，恢复加泰洛尼亚的自治，对外则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西班牙共产党恢复公开活动。

当西班牙人民庆祝人民阵线胜利的时候，反动分子却在策划武装叛乱的阴谋。早在1935年6月，长枪党即在“政治洪达”会议上通过了武装暴动的决议。其他一些反动组织也酝酿同样的计划。只是他们幻想在新的议会选举中合法地攫取政权，才推迟了暴动计划的执行。1936年2月议会选举的结果，打破了反动派通过合法手段夺取政权的幻想，他们决定用武力推翻共和国政府。长枪党的武装集团、传统派分子卡洛斯派的战斗组织以及军



事同盟等，对武装叛乱的准备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一些反动将领如何塞·圣胡尔霍、弗朗哥、埃米略·摩拉等，也都参加了阴谋的策划。反动分子凭借他们在国家机关和军队中占据的要职，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教会和外国势力的财政援助下，迅速建立了遍布全国的秘密组织。他们加紧在军队中特别是在西属摩洛哥的驻军中进行策反工作，并定圣胡尔霍将军为“新国家”的领袖。7月上旬，西属摩洛哥的驻军举行军事演习。许多天主教神父和僧侣脱下长袍，换上普通衣服，参加叛乱准备工作。一些地区的教堂和寺院变成了暴动的中心。大资本家则把资金转移到国外。大商人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大地主宁愿不收割庄稼也要解雇雇农，以破坏国家的正常经济生活，损害共和国的威信。

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策划武装暴动阴谋时，直接得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支持和援助。1936年3月，圣胡尔霍将军专程前往柏林，同纳粹头子进行有关德国援助西班牙反革命军事组织的谈判，最后商定向德国“商行”购买大批军事装备。德国在西班牙的间谍直接参与了军事暴动计划的制订。至于墨索里尼，早在1934年3月底就已答应给西班牙反动分子以物质上的援助，许诺在反动分子发难时提供一万支步枪、两万颗手榴弹、两百挺机关枪和150万比塞塔。

1936年7月中，不断传来法西斯即将叛乱的警报，形势危急。7月15日，西共总书记狄亚斯在议会警告说：“大家要当心！反动派准备叛乱！”可是，左翼共和党人政府对平定叛乱过于自信，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来制止叛乱的发生。

7月17日深夜，在位于西属摩洛哥的休达电台播放“整个西班牙晴空万里”的暗语指挥下，叛军在西属摩洛哥、加那利群岛和巴利阿里群岛首先发难，另一叛军将领摩拉则在西班牙北方的纳瓦拉、旧卡斯蒂亚行动。次日叛乱迅速蔓延到西班牙各地的驻军。7月20日，叛乱首领圣胡尔霍从葡萄牙回西班牙途中因飞机失事身死，1935年5月担任西班牙军队总参谋长、1936年2月调任加那利群岛部队司令的弗朗哥便充当了叛军的魁首。当时，共和国军队的80%，约12万名官兵和大部分国民警卫军倒向叛乱分子方面。叛乱头子计划从南北夹击马德里，在几天内夺取政权。但是，弗朗哥的叛乱遭到西班牙人民的迎头痛击。工人、农民、学生、职员和知识分子响应共产党和人民阵线的号召，纷纷拿起武器，奋起保卫共和国。几天之内，就有30多万人报名参加人民警卫队，经过爱国军民的英勇战斗，马德里、巴塞罗那、巴伦西亚等大中城市的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空军和几乎整个海军站在共和国方面，水兵和下级指挥官们把大部分军舰和潜水艇开进了共和国的港口。叛军只控制南方的加的斯、韦耳发、塞维利亚和北方的加利西亚、维瓦拉、旧卡纳蒂亚及阿拉贡等地区，南、北方叛军被巴达霍斯省隔开。

弗朗哥派人于1936年7月21日、22日到罗马和柏林，请求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给予援助。就在叛乱分子面临失败的关键时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几乎同时作出了援助弗朗哥、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的决定。希特勒对里宾特洛甫说：“德国无论如何不能容忍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西班牙……如果西班牙真的成为共产主义的，法国也将布尔什维克化，那么德国就完蛋了。”除了仇视共产主义和民主共和外，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还有其征服全欧的长远打算。他们若控制了西班牙这个地中海的西部门户和直布罗陀海峡这个咽喉，对英法在地中海的战略基地将构成威胁，英国将不能借此要道直达中、近东，法国则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困境。

7月28日，德、意飞机来到得土安，协助弗朗哥把叛军和军用物资空运到西班牙南方。同时，他们通过海路把大批武装弹药和军事技术人员运送给叛军。7月底，德国建立援助弗朗哥的“W”特别司令部。8月，意大利政府设立“赴西班牙作战委员会”。据统

